

我的青年時代

阮毅成

中外雜誌社長王成聖先生要我寫一篇我的青年時代，我姑且以在中學與大學求學的時期，為青年時代。那是自民國七年到民國十六年，也就是我自十四歲到二十三歲。

少年行「努力毋自阻」

民國七年暑假，我自杭縣縣立第二高等小學畢業，列第三名。第二高小原名錢塘小學，在杭州佑聖觀巷。第一名是葉國華兄，杭州人，家住在杭州宗陽宮大樹下，家中開設一家釘鞋店。他後來似未升學，此後我也就很少再見到他。第二名是王均棠兄，仙居人，他的父親是浙江私立體育專門學校的校長，名肇，字卓夫。陳故副總統辭修先生在未入保定軍官學校以前，曾在該校畢業。王兄自幼右手背的骨骼，不幸折斷，經常用紗布敷藥包着。寫字與用膳，均用左手。他後來升入何校，我已記不清楚。但抗戰以前，我就沒有再見到他。

我自小學畢業的時候，先父正從杭州到寧波

去旅行。先父一向有氣喘病，平時很少出門。那一年，他是四十五歲。他因為應先二叔之約，一同去遊普陀，才到甯波去的。先二叔時在甯波任事，從甯波經過鎮海，就可以到普陀。他在動身之前，就對我說：「如果小學可以畢業，就準備投考浙江省立第一中學。」並預先約定二高的國文教員趙敏哉先生，在暑假中，來家為我補習國文。

我的小學畢業典禮，係在水亭址杭縣勸學所舉行，儀式甚為簡單，也沒有很多人演說，只是由所長范耀雯先生發給文憑。我校畢業的只一班，三十餘人。縣立第一高等小學，原名仁和小學，似也只畢業一班，也只三十餘人，同時參加典禮。我將畢業的名次寫信到甯波，稟告先父，他回信多所嘉勉。

暑假中，趙先生每天上午來家為我補習，主要的是講解孟子，並且每天要作文。趙先生說：「省立一中的國文教員是楊雲門先生（按，楊名學洛，杭州人），他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學家。

他每次出的題目，都在孟子。」趙先生是滿清末年的秀才，他不但講解精詳，並且改作文也十分用心。有眉批，有總評，有圈點。每改一字也說明其原因。下次我如仍未注意，他必定說：「我對不起尊大人」，他雖則語氣和藹，態度安詳，而其意義却是很嚴肅的。我聽了之後，就會特別警惕。

我現在還保存有當年的作文簿，任選錄一篇如下，可以看出當時對國文教學的重視，與小學畢業生的國文程度：

民為貴

處今日共和之時代，莫不曰尊重民意矣。若戰國時代，國君好行專制，大權在於一人，人皆知有君，不知有民矣。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君之視民，更犬馬奴隸之不若矣。惟民貴之說，孟子能首倡之。亦謂國無民，何以為國；君無民，何以有君。國祚有短長，而民意無盛衰也。國運有否泰，而民志無變遷也。是以國政有改革，而民氣初無常變也。斯

我進入了省立二中，先父寫了一篇少年行給我。先父平素不喜做詩，他認為是無病呻吟。這一篇好像是爲了應杭州愉園詩社的徵稿而寫的，題目也是詩社定的，適在我入中學之始寫成。全詩意義，在於勉勵少年要自立自強，我至今不敢忘記！

少年何所能，能爲狎邪遊，酣歌更恒舞。少年何所持，恃有父兄蔭，幸福天所予。豈知金烏尚有西墮時，滄海且見揚塵土。爾父爾兄非金石，一旦身亡誰庇汝。學商不識物貴賤，學農不耐胼胝苦。儲金揮盡童僕逃，田畝荒蕪屋宇火。昔日灸手可熱時，抗糧不納孰敢侮。今日冰山已傾倒，催租吏來如狼虎。無錢無米捉將去，三日一比痛痛苦。答後仍須力籌繳，投親訪友無人顧。此時深悔少年時，呼天呼父將何補？告爾同胞衆少年，及時努力毋自阻。

杭州一中名師瑣憶

浙江省立第一中學，在杭州橫大方伯。從我青年里家中步行，過官巷口，炭橋，豐樂橋，就到了，大約有三華里路。民國二十年以後，這條路改爲柏油馬路，一直通到城站，也就是杭州的火車站，並改名爲新民路。

我在中學一年級的課程是：每週國文八小時，分左傳，古文，習字，作文及黑板練習五項。英文七小時，分讀本，文法，及習字三項。算術五小時，分數學（幾何）及簿記兩項。體操四小時，分兵式，普通，及拳術三項。本國歷史，及

本國地理各二小時，圖畫、手工、與樂歌各一小時。到了二年級，另增加博物與修身兩課。

其時校中的教師，是：

- | | |
|----|-------|
| 校長 | 吳文開先生 |
| 國文 | 楊學洛先生 |
| 英文 | 施仁榮先生 |
| 數學 | 洪鏡西先生 |
| 歷史 | 鐘毓龍先生 |
| 地理 | 王夢僧先生 |
| 博物 | 宋知方先生 |
| 修身 | 陳省齋先生 |
| 音樂 | 王華恩先生 |
| 圖畫 | 樊希忱先生 |
| 手工 | 王伍先生 |
| 體操 | 王擎柱先生 |

校長吳先生，是嘉興人。楊先生是杭州的名古文学家兼名書法家。民國初年，杭州西湖上的許多聯匾，及市內的許多店舖招牌，都是他寫的。據說他寫字時，先將毛筆的筆尖剪去，所以才會別成一格。我們一批同學也跟他學，剪去了筆尖寫字，自然更寫不好了。楊先生的弟弟名學浚，字雲谷，也長於書翰。民國二十七年八月，我到浙江省政府任事，由劉百閱兄介紹，來任我的秘書，方始認識。抗戰期間，同歷患難。勝利回杭的第二年某日清晨，忽於如廁時以腦溢血逝世。至於其令兄雲門先生，則在杭戰前即已謝世了。施先生字少明，餘姚人，與我家爲同鄉。他在滿清末年，在浙江等學堂畢業，與蔣夢麟先生同鄉，同班，又同時考取官費留美。蔣先生出國

了，而施先生的雙親因爲不放心他作萬里之行，遂放棄了留學的機會，就在杭州各中等以上學校教英文。寒假期中，先父並曾聘他到我家中，爲我補習。我最初習法文，也是他教的。

鐘先生講中國地理，能在黑板上，隨手畫出任何一省的地圖，凡山川、城邑、鐵路、港口，均位置正確，同學都非常佩服。他後來任私立宗文中學的校長，校址在皮市巷，與一中爲近鄰。抗戰勝利之後，杭州市設立市參議會，我請他任議員。其時他已年逾七十，但對於地方的事，仍甚爲熱心。

樊先生是杭州的名畫家，清末的秀才，也是清末名家戴醇士（熙）的學生。他每次上課，先用粉筆在黑板上畫一張畫，而後要坐在教室中的一批大孩子臨摹。他畫的無非是一座山，一條船，一個亭子，一個人，和幾株樹。有時候山在左邊，亭子在右邊，人在亭子裏。有時候山在右邊，船在左邊，人坐在船上。其時他已是古稀之年，鬚髮皆白。慈祥愷悌，就是沒有教授法。所以，我們跟他上了一年的課，什麼也沒有學會。

王先生也是杭州的名教師，兼了許多學校的課。不但長於手工，且擅長畫貓，栩栩如生。有一年寒假，先父特請他到家中來爲我補習手工。當時還沒有雙手萬能的口號，而先父却認爲一個人應該懂得如何勞動。王先生教我木工、鐵工、蠟工、及用石膏製像等等。他知道我缺乏繪畫的天才，所以並未教我如何畫貓。

洪先生是揚州人，講的一口江北話。我因爲係在江蘇省興化縣出生，聽來並不費力。而其他同學，尤其是來自浙東各縣的，總覺得不順耳。

洪先生講授幾何，常常在黑板上寫公式，當他寫上三點時，他總說所以如何如何。因之，同學就在背後稱他爲「洪所以」，有時就稱他爲「洪三點」。到了二年級，洪先生走了，改由郭成九先生教幾何，郭是杭州人。

陳先生是臨平人，講話喜用成語。民國十二年冬季，我的堂姐靜成，與陳中孚君結婚，我才知道就是他的令侄，所以兩家就成爲親戚了。

我在一中一學期多，生活很平靜，成績也有進步。但圖畫、手工、音樂、體操等門，只能勉強及格。

五四遊行示威與開會

五四運動一發生，我們平靜的學生生活，完全變了！

首先是杭州有了學生聯合會，學校有了學生自治會。我先當選了學生自治會的評議員，又當選了出席學生聯合會出版委員會的代表，常常要忙着開會。當年一同在杭州學生聯合會工作的人，現在在臺灣的，尚有羅霞天兄與毛彥文女士，羅是立法院立法委員，毛是國民大會代表。

再則是抵制日貨的運動，各校學生分組到車站，輪船碼頭，商店中，去檢查日貨。原有的加以查封，新運到的加以扣留，送到學生聯合會去處理。我被派到南星橋車站，接連多少天，並未查到日貨。因爲這只是從杭州到江干的一個中間小站，平時就沒有多少洋貨進出。我們這批中學生，只得在車站上拾石子玩。每天等到最後一列火車過站了，才回家修息。

再則是示威遊行。爲了響應北京的學生運動，爲了支援上海的罷課罷市運動，每隔幾天，就有一次全城學生大遊行。我除了要參加遊行外，還被推擔任草擬傳單，傳單都是用毛邊紙油印的，有標語，有漫畫，每次還要有新的內容，和刺激的語句。而各校所發的傳單，無形中還有競賽，大家都不願被人批評爲平凡不足道。我曾將當時各校所發的遊行傳單，彙集起來，釘成一厚本，可借在抗戰期中失去了。

還有就是開會，聽演講。其時北京、天津、上海，不斷地有學生代表到杭州來，報告各地學生運動情況。最早到杭州的北京學生代表，是北京大學學生金華人方豪。方字叔新，抗戰前後，均擔任浙江省立金華中學校長，我常與之見面。當時演講地點，多在平海路（國民政府成立後，改名英士街）浙江省教育會大禮堂。

於是，自五月起，一直到放暑假，就沒有上過幾堂課。連學期考試，也在廢除考試制度的口號下，沒有舉行。

過了暑假，我們一班，自然地升爲二年級。現在要說一說白話文運動。

我們的國文教師楊先生，既然是杭州有名的桐城派古文家，應該是不會贊成白話文的。五四運動以後，他照常上國文課，照常出題目要學生寫作文，而我和少數的幾位同學却改用白話文交卷。最初，我們是試試看，看楊先生會不會責備我們，不該用白話作文。而等到作文發回來的時候，楊先生却一樣的予以圈點，一樣的予以評語，一樣的予以分數，並未有一點呵責，更不會因

爲用白話作文而少算了我們的成績。這在試探的作用上說，我們是勝利了。

我用白話作文，事實上並不是自五四運動以後，方才開始的。當我尚在杭縣縣立第二高等小學二年級求學的時候，我們一班有兩位國文教師，一位是在前面提到過的趙敏毅先生，他教文言文。另一位是張元孟先生，他却教白話文，張先生其時已過了六十歲，他先用白話，寫了一篇無怒軒記給我們讀，並且在黑板上寫道：「學生作文，往往困難萬分。其意徑筆路滯塞故也，故必以快利之文藥之，而後沉痾可起。抑近來校中讀本，程度過高，實不適用。若必膠柱鼓瑟，是驅億萬子弟於陷阱也。書賈志在求利，而教員不可不負責任，且亦不忍立視其死，故擬此以示諸生。知我罪我，聽之而已。」張先生要我們每一位同學，將這一段抄下來，送給他看，他在每一張上簽了「教正」二個草字。從此，他就教我們用白話作文。他說：「語言爲文字之本，不練習語言而譁然作文者，皆癡人也。」

有一次，他出了一個作文題目：「望雨」，我用白話寫成交卷。他看了很滿意，在我的卷子上批了大段：「區區白話耳，苟非各種文法具備，何以能此？甚矣！即此練習語言，亦有憂乎其難之者。後生小子，其可忽諸。」

漸漸地，張先生教我們如何將各人自己寫的古文，譯成文言。又選了些淺近的古文，教我們如何譯成白話。

張先生在五四運動的前兩年，已經在小學中教學生白話文，真是得風氣之先。但他只是一位

小學教員，又是在杭州。雖以花甲之年，提倡白話文，竟沒有多少人知道。我這個在當年親受教誨而又確實得到益處的，是有為之宣揚的義務的。張先生的長公子子成先生，是二高的英文教師，所以，他們父子二人，都是我的業師。

十五歲辦明星月刊

在民國八年的暑假，一中又招新生。九月開學，校中盛傳這一年的新生狀況，在應考國文時，是用白話寫的試卷，可見楊先生是真正的也贊成白話文了。否則，他怎麼會給這位新生最高的分數呢？於是大家都急着要見這位榜首，那知道他到校註冊時，竟是一位身穿藍布大褂，鼻加潤邊眼鏡，足穿老布鞋，並且還有些駝背的老年。他姓查，名猛濟，字寬之，浙江省海寧縣袁花鎮人，是清初查士標之後。他一向在私塾讀書，從未進過小學，所以國文的基礎比較好。

查寬之兄雖則比我低一班，但我因十分欽佩他的白話文，所以就常去向他請教，於是我們就想出版一份提倡白話文的刊物。我當時是十五歲，寬之比我大，也大不了多少。因先父在杭州辦有浙江印刷公司，是杭州最早的鉛印工廠之一，印刷自然方便。其次便是稿件與經費，稿件決定由我們自己寫，經費則移用我們自己的儲金。

我們怎麼會有儲金呢？原來在五卅運動發生之初，全國學生有儲款贖路的運動。便是要集少成多，將山東省境內的膠濟鐵路，自日本人手中贖回。我們在校中，遂也有救國十人團的組織，每人每日或每週須儲蓄銅元數枚，交由推定的幹事

保管。其時大洋一元，可以換銅元三百枚。我是走讀生，便參加同一個自修室的十人團。家中每天給我的零用錢，都捐作儲款。及至暑假以後開學，全國的贖路運動，已趨於冷淡；而我們這一團的所收的儲金，共只有幾元大洋，遂移作為我們自辦刊物的印刷費。

刊物的名稱，定為明星，每月出版一次。第一期於民國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，由我寫發刊詞，約長一千字。大意是說：各地都有新文化運動的刊物，素以文化之邦自命的浙江，獨付闕如。我們能力雖小，却願意盡一點力。這是浙江省用白話文，用新式標點，介紹新思想的最早刊物。說來也許有人不相信，這最早刊物，竟是中學一二年級學生自己創辦自己寫作的。可惜的是這一份刊物，早已無存了，我當時寫的是什麼文章，我自己也忘記了。

我們最初的計劃，是將第一期售出了，得來的錢，再出版第二期。那知第一期出版之後，除分送各校的學生自治會外，竟沒有銷路。贖路儲款用完了，十人團也解散了，團員更沒有力量再辦第二期，明星月刊因而只出版了一期，便告夭折。

但是我並不灰心。我於九月二十九日，寫了幾封信給其他學校中的同學說：「……不如重新辦一個吧！但須徵求下列三種人：（一）能銷，（二）能出錢，（三）能作稿子，兼全就更好」。居然徵得了幾位同好，乃擇定雙十節創刊，刊物名稱就用雙十二字。並且認為明星原係月刊，不够味，乃改為半月刊，由查寬之兄寫發刊詞。

他居然寫道：「……所以我們發刊這種半月刊，最主要的目的，就是一方面竭力把新思潮傳佈，一方面對於守舊派，立於指導的地位，下一種誠懇的勸告。」寬之兄其時只是舊制中學一年級的學生，而我們當時的自命不凡，可以想見。

雙十出版之後，因為內容豐富，立即轟動了杭州各中等以上學校。許多學校的學生，紛紛來購買，還有許多學校的教師寫信來鼓勵。我現在摘抄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國文教師的來信如下：

我很佩服你們的精神魄力。雙十在杭州，不能不看做是一顆的明星，希望你們格外努力。做事創始為強，繼起較多。各校學生中，如有能熱心文化運動的，不妨互相聯絡，都作為編輯員。最好能設法改為週刊。

我們得了這樣大的鼓勵，自然格外振奮。不久，就有各校學生表示願意參加，其中最多的是省立工業專門學校與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高年級的。他們的程度比我們高，辦事能力也比我們強。於是就在我家中的大廳，開了一次談話會，共到二十八人，決定改為週刊。雙十只出版了兩期，就再改為浙江新潮。蓋在民前八年，浙省的革命黨人孫翼中、蔣智由、蔣方震，曾在日本東京創辦浙江新潮，鼓吹革命，所以我們稱為新潮。

浙江新潮是週刊，仍由寬之兄寫發刊詞。在明星與雙十出版的時候，均由我任通訊員，浙江新潮則改由一師學生黃宗範擔任，黃較我稍長。所謂通訊員，就是現在的社長兼發行人。好在當時並無出版登記制度，任由我們一批未成年的中學生，自由辦理。

浙江新潮第一期出版時，曾發表聲明：

「(一) 浙江新潮就是雙十的蛻化，精神仍同以前一樣。

(二) 本刊係各校學生以個人名義集合，與各學校各學生自治會無關。」

我們當時並且約定：社中職務，由各人自行認定，不經過選舉。發表的文字，不必先經全體同意，由各人自負文責。

浙江新潮出版後，因為執筆的人水準較高，真可以說是洛陽紙貴。不但學生人手一紙，社會上也爭相傳閱。第一期印一千份，兩天就賣完，立即再版。第二期隨之出版，買的人更多。遠至北京、長沙、貴陽、重慶、廣州，都有人寫信來買。我在雙十與浙江新潮，都曾寫過文章，可惜均早已無存了。

浙江新潮軒然大波

浙江新潮第二期出版後，杭州便發生澎湃的政潮。因為通訊員黃君是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，就有些省議員藉此發動要排斥一師校長經子淵(亨頤)先生。經先生當年還兼任浙江省教育會的會長，位於杭州平海路的省教育會大廈，便是經先生一手籌建的。這是浙江省當時的文化會堂，也是各法團的活動中心。軍閥政府對經先生早加疑忌，適有省議員出面，為浙江新潮提出質問書與查辦案，這是遷怒於經先生的好機會。於是警察機關通知浙江印刷公司，不准再承印浙江新潮，我們還不知道事態已萬分嚴重，仍派人到上海去印第三期。印好之後，由我到杭州城站去

接，再行分送。警察機關乃又下令禁止發行，我們只得停刊。參加的工專同學，為校長許緘夫(炳堃)所迫，登報聲明脫離。省立一師的經校長，則由省長公署派教育廳科員富光年到校查辦，終被免職。

浙江省議會當時的議員總額為一百五十二人，因浙江新潮提出的質問書，共有兩件。其一是朱文提出的，連署者五十一人。其二是阮尚傳提出的，連署者十四人，又省議員余炳光、陳衛另提出查辦一師校長經亨頤的議案一件。

質問書與查辦案都針對經校長而發，說他：「盤踞造就師資之師範學校；倡最荒謬最狂妄之學說。」又說：「浙江新潮第三號有本刊雖受壓迫，但是我們的精神和主張仍舊進行等語。怙惡不悛，已可概見。並載通訊處為該校黃生。」又說：「此項報紙，由該校校長在校內發行。」又為四百兆人民福利計，僅依法提出查辦。」事實上，我們只是提倡白話文，並且早已說明係各校學生以個人名義辦理，與各學校無關。其後在抗戰期間，我在浙江省政府任職，常到各縣訪問，每遇及當年的省議員，談起浙江新潮事件。我說：「經校長確實不知道我們辦刊物，我們也從未與他見過面，他竟受了我們的連累。而省議會逢迎軍閥政府，故意製造政潮與學潮，以打擊經先生，更是我們所未曾料及的事。我們當時只是十五歲左右的中學生，那知道政爭的背景。諸君在查辦文中，謂為四百兆人民計，更是太看重了我們。」他們聽了，也覺啞然失笑。

經校長的後任，是姜伯韓(琦)先生，溫州

人，曾在日本習師範。他奉令後到校接事，學生因為要挽留經先生，發動罷課，並列隊於校門至校長室之間，不許他到職。警察機關乃派警察包圍學校，迫經移交；學生徒手抗爭，幾致流血。學生每日出版錢江新潮一紙，也用白話文，敘述學生的意見。僵持了幾天，教育廳又下令提前給放寒假，並由經校長再三勸慰，風潮始告平息，姜先生乃得到校視事。

至於省立一中方面，校長吳文開也被迫辭職，他更是無辜而被株連的。我們辦刊物，他完全不知道。新任校長是校中原任數學教師的郭成九先生。他到職之後，就召開校務會議，議決開除學生十人，查寬之兄當然在內。其中有一位王乃寬兄，係自中學一年級起，就和我在教室中同坐一張長檯的。他是諸暨縣牌頭鎮人，比我大三歲。因為他是住宿生，我是走讀生，我有些書籍簿本，不必每天帶來帶去，就存在他處。我介紹他看新青年新潮等雜誌，他乃也贊成白話文，也參加了浙江新潮，並未寫過任何文章，竟也被開除了。乃寬兄後來入上海浦東中學，再入南開大學，又到美國習航空，頗有成就。寬之兄就從此未再入學校，抗戰時期任國立英士大學國文教授，為自學成功的一人。

至於我呢？却因為先父當時是浙江私立法政專門學校的校長，杭縣律師公會會長，在社會上著有聲望。據說在校務會議席上曾討論很久，結果決定只予以訓告。先父聽到了，大不以為然。立即寫了一封信給郭校長，原信如左：

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長鑒：五四以來，各處

學生過於活動，誠不免流於一偏。然此乃我國近數年呆板教育之反動力，苟思補救方法，必須集合全國教育專家，詳細籌劃。斷非一二官吏之武斷，所能解決。前聞貴校有斥退學生之議，比以小兒戩成，亦在嫌疑之列，未便置詞。茲悉貴校教職員會議議決，將與學生聯合會及學生自治會有關係者，斥退十人，小兒僅予訓告。教職員諸先生對於小兒如此成全，詎不心感。然小兒固爲學生自治會評議員，且曾爲浙江新潮社社員，如以爲罪，則不能比其他十人末減。同罪異罰，跡近賈友。小兒立身之始，不願其蹈此惡習，致負諸先生期望。謹爲聲請退學，俾其實踐犧牲之說，留爲五四學潮之紀念。老悖之見，當荷鑒諒！

阮性存謹啓 民國九年二月十八日

先父其時才只四十七歲，自稱老悖之見，實係當時最富有新思想的人。他對我所闖的大禍，一點沒有責備，還寫了這樣的一封信，使杭州的教育界爲之震驚。一中的新任郭校長與教職員，都感到沒趣。親友則無不爲之讚嘆，而我乃亦更成爲被注意的人物。

在浙江新潮出版的時候，杭州市上發現了另一張週刊，稱爲獨見。紙張大小，印刷排版，都和新潮一樣。所不同的，是完全用文言文，並且堅決反對白話文。獨見出了幾期，也就停刊了。後來才知道是凌獨見君獨力發行的，他家在杭州官巷口開了一家規模不大的柴炭店，他一直在私塾讀書，未進過學校。他要循道，並沒有受人指

使，更沒有受人津貼。過了好多年，我才看到他本人，年齡與我相做，却是一臉的大麻子。談到往事，大家一笑。抗戰以前，就沒有再見到他。

五十年前東洋便當

民國九年二月，我自浙江省立一中退學，但並未因之失學。

先父決定先在家中補習半年，由他自己講解文史，自史記，漢書，資治通鑑，以至東萊博議。要逐句圈點，要背誦，要做札記。並且每天要做作文，有文言，有白話，均由他自己批改。另聘請施少明先生，到家中來教英文。晚上，並到基督教青年會去補習英文，那是隨班上課的。至於數學，則請青年會的馬宗德先生補習幾何，那是每天下午去，單獨上課的，課本則用英文原本。

這樣在家中補習了半年，功課較在學校中，還要繁重。並且將自五四運動以後，因示威、游行、罷課，及辨刊物等所耗去的時間，都補了回來。查寬之兄在離開一中後，仍住在杭州，在一家報館中任職，常常來看我。先父也很賞識他的文章，常與他談得很多。我乃對寬之兄說：「我們現在應當覺悟了，我們太年青，知道得太少，應該先好好地把書唸好才對。」於是，我們乃發起組織一個讀書的團體，稱爲悟社。並且宣佈我們的宗旨，是「以知悟人，以力助人。」悟社的成立，距明星月刊的出版，爲一年差兩天。悟社的社員，在各地成立讀書會，除各人自己讀書之外，還要把每次所讀的，於一定時間，用口頭或書面，向其他的社員報告。再將這些報告集合起

來，用鉛印。印成叢刊，公開出版。可惜的是悟社叢刊若干冊，因連年戰亂，都散佚了。

民國九年秋季，先父認爲在家中補習，總不易多得良師益友，還是應該進入學校，乃商得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姜伯韓先生的同意，准我入校爲旁聽生，這是該校前所未有的特例。因爲一師學生全部是公費，並且一定要住在校中。我的志願既不在師範，而一師照規定又不能收轉學生或插班生。我只得每天自家中步行五華里路，到貢院的校中去上課。下午課畢，再步行回家。不論陰、晴、雨、雪，每天都是如此。其時杭州除新市場有新式馬路外，仍多爲舊式街道，狹窄不平。我每天要走過許多彎曲小巷，才能到達。至於午飯，則我既係旁聽生，自不能進入校中的飯廳，與同學們一同享受公費伙食的權利。先父便到銅匠店中，將其昔年在日本留學時所用過的便當，畫了一個圖樣，交其定做。做是做成了，却又大又重。校中廚房不能爲我蒸煮，所以便當中，只能帶些麵包牛肉等冷食的食品。便當在今日臺灣，十分普遍。但在五十年前的杭州，我是最早的，也是唯一的攜帶便當上學的人。我既要步行上學，要帶書包，又要帶沉重的便當，下雨時還要帶雨傘，負擔真是頗爲沉重。

一師學生的寢室與自修室，是分開的。我既係走讀的旁聽生，自不需要寢室，却也沒有分配給我自修室。每一間自修室，大約有十六位同學，每人有書桌和椅子。我在課餘的時候，只得到熟識的同學房中借坐。他們於午間去飯廳吃飯，我就坐在同學的自修室中，打開便當盒，一個人

吃冷牛肉與麵包。

其時，經校長子淵先生雖已離職，但他所聘的優良教師，還都在校中繼續任教。因為我是杭州五四時期的人物，其他的各中學都不願意收容我，這是先父不得已才使我到一師做旁聽生的原因。但一師的教師們却並不對我見外，反而多方鼓勵我努力向學。同學們更不論年級高低，都待我極好。每逢考試，我這個旁聽生本來可以不必參加。但是我總自己要求應考。教師照樣批改我的考卷，給我分數。

從旁聽生到中國公學

我因為是旁聽生，可以不受年級的限制，由我自己選愛聽的課。只要時間不衝突，我可以自由地出入於不同年級的教室，也因之認識了所有的有名教師，與每一級成績優良的同學。

其時一師的教師，是：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國文 | 沈仲九先生 | 夏丐尊先生 |
| 英文 | 劉延陵先生 | 朱自清先生 |
| 史地 | 鄭鶴春先生 | |
| 生物 | 王祺先生 | |
| 化學 | 陳邦材先生 | |
| 教育學 | 袁易先生 | |
| 音樂 | 金咨甫先生 | |
| 圖畫 | 姜丹書先生 | |

擔任國文教師的四位先生，都是當代的名家，也都是寫白話文的。我在一師一年半，受到他們的益處最多。他們所手改的我的作文，尤以沈

先生與朱先生，改得最多最勤，我一直保存到抗戰，才因杭州淪陷而遭損失。

王祺先生，字淮君，別號思翁，湖南衡陽人。頭大而禿，鬚密而粗，兩眼閃耀有光。眉長面胖，精神充沛。他講的一口湖南土話，並不容易聽懂，但是他書宗古篆，雜以北魏，畫宗八大山人，得其神韻，故同學咸樂與之親近。尤其在他作書作畫之時，歡迎同學在旁觀摩，他並親加解釋。雖彼此之間，言語不甚暢達，但見他於下筆得意時，常手不停揮，口不停講，同學則無不感佩讚嘆。抗戰前我卜居南京，王先生住在碑亭巷，我到中央大學去授課，常經過他門前，乃時有往還。而抗戰開始前一個月，先生竟以肺病在原籍逝世，享年只四十八歲。

袁易先生字新產，浙江嵊縣人。他最關心我的學業與前途。

金先生與姜先生都是李叔同先生的高足，姜先生還兼教手工。李先生在一師教過五年書，但是等我到一師做旁聽生的時候，他已經於兩年前在杭州虎跑寺出家，成為弘一法師了。但是我們上音樂手工圖畫課的課室，却還是李先生在校時的老教室。尤其是音樂教室，是一座獨立的西式洋房。四圍花木，一塵不染。教室的四周，皆為走廊，廊上有橢圓形的牆圈。金姜兩先生常常提到李先生，說他如何善於教學，如何得學生與校工的愛戴。說教室中的一桌一椅，如何會為李先生撫摩過。教室外的一花一木，如何會為李先生栽培過。遺範猶存，餘韻不絕。

民國十一年春，我在一師已經旁聽了一年半

。袁新產先生來拜訪先父說：「世兄既志不在師範，而旁聽生又無學籍。現在有舒新城先生新應吳淞中國公學附屬中學之聘，往擔任主任，欲在校中試行道爾頓制，托我在杭州招生，想勸世兄投考」。先父素來敬重袁先生，因為他是一位講求樸學的教育家。而且認為我已十八歲，可以出外就學，且吳淞離開杭州不遠，來往甚為方便，便接受了他的建議。

考試的地點就在一師，主試就是袁先生。在杭州報名應考的，只有三個人，當天就考畢。過了幾天，袁先生來對先父說：「吳淞校中有通知來，世兄取入舊制中學三年級下學期」。後來我才知道另外兩人都都考取了，一位與我同班，一位比我低一級。我於民國七年自小學畢業，在民國十一年暑假，本應該可在舊制中學畢業。現在退了一級，也就是要在中學讀五年。先父與我自己都認為自五四運動以後，雖則未曾失學，究也已荒廢了不少時間。多讀一年中學，也是應該的。所以，便欣然地到吳淞去入校了。

(下期續完)

中外雜誌社啟事

本誌承讀者賜寄大作，日有數起，深為感謝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我們誠懇請求作家們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並請署真實姓名，否則請勿投寄，以免徒勞往返。